



HAL
open science

法国的新批评与美国拘理论

Jeanyves Guérin

► **To cite this version:**

Jeanyves Guérin. 法国的新批评与美国拘理论.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 Zhong guo wen xue pi ping / Zhong guo wen xue pi ping bian ji bu, 2015. <hal-01417113>

HAL Id: hal-01417113

<https://hal.science/hal-01417113v1>

Submitted on 15 Dec 2016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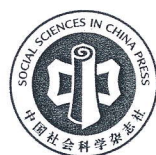


HAL Authorization

中國文學批評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2015/03



SSCP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法国的新批评与美国的理论

让尼夫·盖兰著 孙婷婷译*

张江教授的长文^①首先表明了两点：一、他提出的认识论问题切中肯綮；二、文学文本的阅读与评价方法应该受到质疑与批评。张教授的例证与引文均出自英语世界的著作，这些作品多数还没有译介到法国。大西洋是一道文化屏障，一道虽不严密但确实存在的屏障。

法国的理论在北美成为“新批评”(la Nouvelle Critique)^②的失真的影像，是因为哲学家盖过了文学家的风采。它风靡美国良久，如今似乎衰微，却又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我们知道，学派、主义可以产生精品，有时也滋生糟粕。艺术是轻松的，困难的是批评。批评本来是一种艺术，却幻想成为科学。

在我看来，张教授对强制阐释提出的批评恰当而深刻。的确，强制、滥用和野蛮的阐释，即所谓的过度阐释以前有过，如今也仍然存在。既定的条条框框被生硬地箍上所有的文本而不加区别，文学文本于是沦为一种借口，用以证实某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假设。^③文学对象的特殊性却被遗忘殆尽：它是一种审美创作，不是机械的物质生产，更不是一份档案资料。背景、传统、文体、语言都切实存在，有着它们各自不容忽视的逻辑。张教授对“教条主义”的谴责也完全合理。当某个批评流派形成体系，抛出一种信念(doxa)、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就暴露出盲目崇拜某种“万无一失的方法”的危险，同一种方法被蛮横地套用在所有时代的所有作品之上——姑且称之为万灵药或者通用工具症候群。

张教授在文章中援引的例证——某些批评流派对于《哈姆雷特》和《厄舍老屋的倒塌》的解读——的确荒诞不经。哪怕有强硬态度和专业术语的包装，愚人之见也仍然是愚人之见。莫里哀或者欧也尼·伊奥内斯库如果健在，大概可以写出优秀的剧作，揭示其中的种种可笑。解读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口不择言和书写随意。不合常理、违背原意、胡言乱语等情形都会发生。新批评教给我们文本的多义性，文本不受作者和批评家们的约束。保尔·瓦雷里说过：“文本没有真正的意义”。^④这位身兼理论家的诗人的意思是：作者无法决定其作品的意义。他的话对于批评家们也同样适用：没有毫无遗漏的、一劳永逸的解读。对一个文学文本进行阐释是可行的。阐释的睿智与恰当程度不等，但也可能是错误的。

在法国，1965年至1980年既是论辩也是斗争的一段岁月。当时的学术权力掌握在保守派手里。索邦大学显然不再是夏尔·佩吉曾经攻击过的学术堡垒。知识面的广博和对文学史的了解

* 作者让尼夫·盖兰(Jeanyves Guérin)，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法国现当代文学专家。译者孙婷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 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② 这里的“新批评”专指法国1965—1980年间的先锋运动，与英美的新批评(New Criticism)无涉，详情请参见下文。——译者注

③ 参见《强制阐释论》中“主观预设”的部分。——译者注

④ Paul Valéry, *Au sujet du Cimetière marin. Variété III in Oeuvres*, t. 1, Paris: Gallimard, coll.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57, p. 1507.

在大课中占有更多的比重。朗松的徒子徒孙们制定着规则。实证主义与印象主义结成联盟。教授们都是杰出的学者，写过长篇大论的国家博士论文。他们并不了解来自中欧、大西洋彼岸甚至邻国瑞士的研究，正像他们通常对新小说与新戏剧等当代文学一无所知——这是他们与美国同行的另一个重大区别。瓦雷里、阿尔贝·蒂博代以及阿尔贝·贝甘等人从前执教的地点，是法兰西公学院、日内瓦大学或者巴塞尔大学。从20世纪初开始，索邦大学的研究计划已经剔除了在世的作家。现代派于是向守旧派的要塞发动进攻。先是《写作的零度》，然后是《论拉辛》^①将罗兰·巴特推举为现代派的旗手。这些作品在当时颇具颠覆性，动摇了实证主义的信念，引发了强烈的争议。这便是“新批评之争”。古典文学研究与人文科学发生碰撞。

如今，这场争辩已经纳入文学史。我们已经忘记，在1965—1966年间，新闻媒体甚至是左派的批评，几乎全部支持罗蒙·皮卡尔声讨巴特的檄文。^②然而，这只是一场以正统的趣味、习俗、理性和明晰为名义而进行的垂死挣扎。作为历史学家和实证主义文献学家，皮卡尔是守旧而专断的。然而，这位考虑欠周的论战者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后世对他的评判有欠公允和宽容。因为就在同时，现代的超我代替了旧有的超我。当今通行的、涵盖了从萨缪尔·贝克特到克洛德·西蒙等人的文学标准均来源于此。无论在戏剧小说的创作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尚新的习惯^③都已成为霸权。也许，20世纪60年代末形成的法国理论是20世纪最后的先锋——较之于艺术方面的创新，这场先锋运动更具有精神上的意义。它的衰落与文学创作的平淡相影相随。

新批评形式不一。一方面，它与语言学联接，另一方面，它向人文社会科学开放。新批评的阵营里，有加斯东·巴什拉的信徒，有弗洛伊德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更有形式主义者。他们的联盟是因势而成的。然而，努力融汇各种学说的尝试——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还是骤然中断了。形式主义或者结构主义批评启用一套极为复杂的方法，在描述日益复杂的运作以及将之理论化方面，有时会黔驴技穷。

新批评的成果依然存在。事实很快证明：在现代派中间，更有条理而不那么独断的形式主义者最擅长应付学术机构的各种限制。因为一些体制的原因，或者囿于认识论，他们更注重与语言科学的正面接触：二者之间的联系往往艰难而混乱，但是具有一些经久的效果。此后，文本和书写处于批评活动的中心。理论家们得到瑟伊出版社的支持，出版社在其丛书中收录他们的著作，^④《诗学》^⑤这本发行至今的文学批评与理论杂志也对他们鼎力相助。大学批评的历史，一如文学史，也无法脱离现实。理论要旅行，就要借助于网络和机构。权威的地位、垄断势力、职场策略以及专横的对象都是存在的。

20世纪70年代是法国制造理论的辉煌时期，是巴特引领风骚的年代。与萨特一样，巴特也逝世于1980年。罗兰·巴特并非只有一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巴特。美国大学里的巴特不同于

① Roland Barthes, *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 Paris: Seuil, Coll. *Pierres vives*, 1953; *Sur Racine*, Paris: Seuil, 1963.

② Raymond Picard, *Nouvelle Critique ou nouvelle imposture*, Jean-Jacques Pauvert, coll. «Libelles», 1965.

③ Harold Rosenberg, *The Tradition of the New*, New York: Horizon Press, 1959.

④ 在瑟伊出版社的目录里，我们可以找到巴特、热奈特、托多罗夫、勒热纳 (Lejeune)、孔帕尼翁 (Compagnon)、达伦巴哈 (Dallenbach)、里查德 (Richard)、谢弗 (Schaeffer) 等人的著作，以及普罗普、雅各布森、艾科、里法泰尔 (Riffaterre)、温里克 (Weinrich) 等人的译作。

⑤ 热奈特和托多罗夫于1970年创办《诗学》，现任主编为米歇尔·夏尔 (Michel Charles)。

法国大学里的巴特。他既是自诩前卫的《原样》杂志的同路人，也是新戏剧的猛烈抨击者。新戏剧的拥趸让他惊慌。他既不与贝尔纳·道特——他的支持人民戏剧的伙伴——的教条主义撇清干系，也不和菲利普·索莱尔斯的狂热盲信分道扬镳。他只是与他们保持距离。别人将他视作唯科学主义者，他自称唯美主义者。教条主义的下面掩藏的是享乐主义分子。在《明室》里，现代性的吹捧者也是现代性的贬抑者。他以散文家的身份离世，却一度皈依古典。他未曾发表导师般的讲话（这便足以使他和萨特、拉康或者布尔迪厄区分开来），没有留下知识或者方法方面的遗产。他的一些建议——例如我们会想到“阅读的多义性”——传播、分散到了整个的精神领域。

信念这种东西并非可以超越时间，恒定不变。巴特原本对它的定位也会发生偏移。如果说1970年前后，法国的知识阶层中存在着某种思维定式，这种定式便是马克思主义。然而，它最常出现的地方不是文学研究领域：吕西安·哥德曼恰恰在1970年过世；剩下的几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大都是19世纪研究专家，很快就让自己的社会批评变了味道。对信念的质疑产生出新的信念。正统被视作异端，异端却成为正统。

最后一个领袖在世的时候，被规约的理论筛选出符合自己标准的文本。文学性成为研究的全部内容。研究者们一方面重新花费气力去读经典，一方面只青睐少数的现代派。很快，与创作割裂的理论开始原地转圈。理论的僵化和先锋运动的消泯同时发生。此后，理论在大西洋彼岸盛行，其最伟大的领袖因为已经过世而被后人顶礼膜拜。至于另外一个享乐主义者菲利普·索莱尔斯，作为理论家，他早已被人遗忘，作为批评家，借助《新观察家》和《世界报》等报刊提供的论坛，他还保留一定的影响力。

后辈们已经对1960—1970年间的学术成果分门别类、各取所需。以此为代价，新批评成为了大学批评。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失利，《隐蔽的上帝》^①也变得落伍：戈德曼主张的在文本与某种社会环境之间建立的对等的结构，无法抵御某些新的历史研究成果和文学分析，但是他有关世界观的看法仍然准确。有了让·贝勒曼-诺埃（Jean Bellemin-Noël）以及皮埃尔·贝亚尔（Pierre Bayard）^②的研究，夏尔·莫隆（Charles Mauron）的心理批评已不合时宜。上述两位批评家^③的弟子人数寥寥。最后，谁还在阅读克洛德·布雷蒙的《叙事的逻辑》？^④谁还在使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大学教授们已经消化并且重组了曾经显得离经叛道的成果，从中汲取了某些批评工具和方法，却很少是一个系统。结构分析已经卸下教条主义的僵化，变得可以与历史学和社会学调和。创立一种抽象理论的想法已经干涸在学院派的沙漠里。批评与诗学之间已经失去严格的区分。如今，在巴特提出的概念中，空白写作、真实的效果、作家和写手之间的区别等，相比于“虚拟的语言法西斯主义”或者他某天想到的“所指对象的专断的意识形态”更加重要。^⑤符号学已经成为什么？——从叙事分析，我们过渡到了叙事话语。我们的爱宠还剩下什么？——无比强大的叙事学。

有一段时间，理论的不足构成严重的阻碍。要对它的先决条件进行阐发，要为它的合法性出示护身符。这段时间已经过去，先锋已不复存在，反文化已灰飞烟灭。因为缺少辩论者，辩论已经中止。1984年，《辩论》杂志曾经发表两篇文章。热奈特捍卫诗学的生机和多产，雷蒙·

① Lucien Goldmann, *Le Dieu caché*, Paris: Gallimard, 1955.

② 贝亚尔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午夜出版社。

③ 当指戈德曼和莫隆。——译者注

④ Claude Bremond, *Logique du récit*, Paris: Seuil, 1973.

⑤ Roland Barthes, *Oeuvres complètes*, t.2, Paris: Seuil, 1993, p.976.

皮卡尔在索邦大学的后继者富马罗利 (Marc Fumaroli) 先生则批评这种诗学, 谴责它是一种“次等的理论虚构”, 其“科学主义”衍生贫乏。这场论争虽然水平较高, 却几乎没有受到媒体的关注。法国或法语区的辩论不再引人注意, 这种情形已经为时不短。论辩局限于一些封闭的圈子, 很少被传播出去。文学批评的地位与文学的地位唇齿相依。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一种社会事实。领袖的时代已经终结。意识形态的末日是某些意识形态的末日。傲慢的教条主义从这里被剔除, 又在那里重新出现。正统的思想、刻板的头脑仍然顽固地存在。学问是一回事, 真理又是一回事。

现在, 让我们到大西洋彼岸去看一看。每张标签都有自己的历史。1930—1960 年间, 美国曾有一个被称为新批评 (New Criticism) 的流派, 一些来自中欧的评论家——尤其是罗曼·雅各布森和勒内·韦勒克——就从属于这个流派。其成员将文学研究建立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之上, 尤其看重诗歌。他们的著作很少被译为法文。他们为新批评^①在大西洋彼岸的落地生根作出了贡献。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 美国的法语文学研究便有意地独立于法国本土的文学研究之外了。鉴于形势, 文本研究的范围受到限定, 更偏重当代的文学作品。这种情形并不新鲜: 大西洋彼岸关于普鲁斯特的研究始于 1920 年前后, 关于加缪的研究则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 这些作家在法国还没有进入经典。美国的大学中, 解构主义占据重要的地位已经为时不短。起初, 解构主义是雅克·德里达哲学批判主义的复兴。他的标靶是西方的形而上学, 包括其前提和悖谬。文学批评则聚焦于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个概念。在新批评 (New Criticism) 成为一种拥有着雄厚学术基础的“元结构主义”的美国, 热奈特、茨维坦·托多罗夫以及菲利普·阿蒙等人的贡献是微小的。雅克·德里达则被认为是不满于一种信念, 而指出了它的局限。耶鲁大学推行的解构主义重新引入了诠释学、哲学甚至主题研究, 它强调读者的地位。这个学派的著作很少被译为法文。

德里达的美国弟子与文化研究——少数族群的积极分子活跃其中——结成联盟。文化研究、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在美国形成体系和高度团结的多元文化社群, 较之于其他地方, 其中的进步知识分子更乐意关注少数族裔。逻各斯中心主义衍生了男根中心主义。法国的理论尤其推崇当下的文学作品, 将注意力集中于“身份”, 对形式分析不屑一顾。文本研究经常被当作材料, 用来证实某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假设。大学授课、学术论文、研讨会暴露出对经典的曲解, 以及对各种价值进行政治正确的等级划分。普鲁斯特于是沦为同性恋作家。《全权》^② 中的五页书写就透露了理解吉罗杜全部作品的关键——吉罗杜只是一个希特勒的信徒。^③ 一些作家被裁定犯有雄性沙文主义罪过, 受到抨击, 进而失去了讲授的资格。到美国参加过学术会议的每个学者回来以后, 都能举出一些受到排斥和驱逐的例子。我们的某些美国同行延续的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偏狭和恐怖主义, 而不是它的研究精神。意识形态专家、甚至学术骗子经常压倒了真正的学者。对德里达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引用, 有时粉饰的只是平庸之论或者蠢话连篇。

以权威做论据——德里达说过, 朱迪特·巴特勒 (Judith Butler) 也说过——在法国不太奏效, 批评的精神在这里一直保持或者说找回了它的权利。正因如此, 张教授提到的阿兰·索卡

① 此处当指法国的“新批评”。另, 本文中凡是没有在括号里加注 new criticism 的新批评均指法国的新批评。——译者注

② 《全权》是法国著名作家与戏剧家让·吉罗杜 (1882—1944) 写于 1939 年的一部作品。——译者注

③ Jeffrey Mehlman, *Legs de l'antisémitisme en France*, Paris: Denoël, 1994.

尔(Alan Sokal)和让·布里克蒙(Jean Bricmont)的令人振奋的论文,^①在法国大受欢迎。这样一种危险——因为确实有过麻烦——似乎在大西洋的法国一方很难想象:这里的人们对概念的野蛮入侵颇多提防,具有图腾功能的引经据典在这里不会打动人心。

哲学家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作出贡献,这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只需想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狄德罗、泰纳……以及晚近的瓦尔特·本雅明、阿多诺、巴什拉、萨特和米歇尔·福柯等人。这里仅举两例:吉尔·德勒兹和凡桑·德孔波(Vincent Descombes)关于普鲁斯特的研究,^②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关于左拉的研究,^③都是权威之论。德里达也有一篇关于安托南·阿尔托^④的划时代的文章。^⑤德里达的其余著述,在法国则很少得到应用。作为哲学家,他在大学里曾经处于边缘。保尔·利科尔的情况却与此不同。《时间与叙事》无疑是对叙事学助益最大的著作。利科尔曾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后者的百科全书式著作一直启发着文学研究,他们也是法国理论的组成者吗?

最后还有一个事实,证明大西洋的确是一道文化屏障:尽管有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和波德里亚(Baudrillard)这两位引渡者,“后现代”的概念还是很难适应法国的水土。只有少数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使用它。小拉鲁斯字典收录了该词,用以指称美国的建筑和纽约的某种舞蹈。法国或者法语区的文学研究则对它很少提及。

《法国书目第二十卷》辑录了大西洋彼岸的批评成果,足以提供大量信息。我们看到,平均每年都有关于莫妮卡·威蒂格(Monique Wittig)和露丝·伊丽格瑞(Luce Irigaray)的文章甚至专著发表,有相关的研讨会举办:反对男根中心主义的斗争使然……检索OCLC公司的在线联合目录(Worldcat)也证实了这一点:德里达被提及16751次,利科尔10265次,朱莉娅·克里斯蒂娃10082次,让·波德里亚4936次,巴特4358次,伊莱娜·西苏2762次,托多罗夫2482次,伊丽格瑞2918次,热奈特只有1528次,菲利普·阿蒙只有912次,让-玛丽·西弗(Jean-Marie Schaeffer)只有806次——他们三位的学术贡献却远远超过了前面列举的学者。不过,幸亏伊莲娜·肖瓦尔特——张教授犀利地戳穿了这位专断的理论家的荒谬思想——也只有1064次。如今,文学批评已经全球化,不只是法语著作,还有很多德语或者意大利语作品都值得译介——例如哲学家吉奥尔吉·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大量著述。然而北美的批评却占据了过分重要的地位,我们对此表示遗憾,并不是要宣扬那种肤浅的反美国主义——菲利普·罗瑞(Philippe Roger)对此进行过(在法国人看来)相当精彩分析。^⑥

每个学科都有其结构、范围、对象和方法。某些研究对象为多个学科共有。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分析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文学,也可以具体地用于一个文本。文学工作者闭门造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学科间性是存在的。张教授恰当地指出:“文学不是哲学,也不是历史或者数学。”它的确是一套符号系统,正像巴特希望的那样,^⑦但它不限于此。文学即使描写虚无,

① Alan Sokal et Jean Bricmont, *Impostures intellectuelles*, Paris: Odile Jacob, 1997.

② Gilles Deleuze, *Proust et les signes*, Paris: PUF, 1970; Vincent Descombes, *Proust: Philosophie du roman*, Paris: Minuit, 1987.

③ Michel Serres, *Feux et signaux de brume: Zola*, Paris: Grasset, 1975.

④ 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 1896—1948),法国演员、诗人、戏剧理论家。——译者注

⑤ Jacques Derrida, *La parole soufflée, Tel quel*, n°20, 1967 et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Paris: Seuil, 1967.

⑥ Philippe Roger, *L'Ennemi américain*, Paris: Seuil, coll. *Points essais*, 2004.

⑦ Roland Barthes, *Essais critiques*, Paris: Seuil, 1972, p. 257.

也终究是描写了某种东西的文学。能指的批评与所指的批评不是不可以调和。如今，法国的学术批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折中。科学讲得少了。最近二十年来，没有特别显著的进步。结构主义运动的最后幸存者把他们的文献目录进一步完善。菲利普·勒热纳连续出书，创立了自我书写的诗学。^① 茨维坦·托多罗夫转战到思想史领域，越来越重视文学的伦理意义，同时并未放弃对形式与结构的关注。^② 热拉尔·热奈特和让-玛丽·西弗则从诗学过渡到美学。^③ 托多罗夫在《批评的批评》^④ 中阐述了自己的学说。西弗通过融汇结构分析、分析哲学和人类学的成果，为文类与虚构带来了新见。^⑤ 无论如何，文学批评的最后一批纪念碑式的著作，如热奈特的《隐迹纸本》、^⑥ 利科尔的《时间与叙事》^⑦ 等，均已问世三十多年了。在戏剧研究领域，结构主义的继承者们，首先是帕特里斯·帕维（Patrice Pavis），受到北美的《表演研究》的启发，将先驱者安娜·于波菲尔德（Anne Ubersfeld）的成就^⑧加以改进，使之不再教条。于波菲尔德抨击克罗代尔或者戈尔德斯^⑨的时候，^⑩ 忘了自己采用的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刻板的话语。今天，最优秀的研究成果来自于人们仍然在读并且永远会读的作家和作品，比如浪漫派作家，比如普鲁斯特和赛利纳，^⑪ 而不是来自于文学整体。并且，在生成批评的名义下，追根溯源的整套工作不是被重新合法化了吗？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历史与哲学是经常彼此无视的领域：这取决于培养、等级和习惯。而当代研究成果的佼佼者，必是这三个学科的对话。

正像以前的某些神学家一样，绝大多数的学者奉行双重真理的标准。一方面，他们崇拜理论及其激励人心的悖论，另一方面，他们却继续相当务实地丰富文学史、关注作家、研究背景等。他们以某种方式调和了巴特和皮卡尔的对立，至少也让他们的遗产互动起来。作家是存在的，文本也是存在的，二者的关系不具有排他性。同理，文学既可以谈论文学也可以谈论世界。现实主义契约既能产生杰作，也能产生平庸的作品。自我指涉也是一样。30年来，价值论基本未变，只是“经典和标准”又纳入了几位当代作家，并且加大了法国以外的法语区文学的比重。人们在现代派的启示下重读古典作品。某些反现代派可以被看做革新者，某些现代派却可以被视为保守人士。

空谈的理论家们力图净化文学研究而依仗的全部范式——作者、文学、历史、风格、价值、意图等——都是极其顽固的。怀疑它们的前提、甚至嘲笑它们，都不足以摆脱固有的概念和成见。理论和批评互相完善，互相限制，削弱了彼此的绝对。也许，我们已经结束了二元逻辑，

① Philippe Lejeune, *Le Pacte autobiographique*, Paris: Seuil, 1975; *Je est un autre*, Paris: Seuil, 1980, etc.

② Tzvetan Todorov, *Nous et les autres*, Paris: Seuil, 1989; *Face à l'extrême*, Paris: Seuil, 1991, etc.

③ Jean-Marie Schaeffer, *Pourquoi la fiction?*, Paris: Seuil, 1999; *L'Expérience esthétique*, Paris: Gallimard, 2015.

④ Tzvetan Todorov, *Critique de la critique*, Paris: Seuil, coll. *Poétique*, 1985.

⑤ Jean-Marie Schaeffer, *Pourquoi la fiction?*, Paris: Seuil, 1999.

⑥ Gérard Genette, *Palimpsestes*, Paris: Seuil, coll. «Poétique», 1982.

⑦ Paul Ricoeur, *Temps et récit*, Paris: Seuil, 1985.

⑧ Anne Ubersfeld, *Lire le théâtre*,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77.

⑨ 贝尔纳-玛丽·戈尔德斯（Bernard-Marie Koltès, 1948—1989），法国著名剧作家。主要作品有《黑鬼与狗群的搏斗》、《回到沙漠》等。——译者注

⑩ Anne Ubersfeld, *Bernard-Marie Koltès*, Paris: Actes Sud Papiers, 1999; Paul Claudel, poète du XXe siècle, Paris: Actes Sud Papiers, 2005.

⑪ 赛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 1894—1961），法国作家，著有小说《茫茫黑夜漫游》、《缓期死亡》等，是现代小说创作方法的开拓者之一。——译者注

结束了极端的非此即彼，结束了蔓延很久的“要么全部，要么乌有”的思维。还要再说一遍：没有一种阅读是面面俱到和一劳永逸的。

实际上，理论的运用有好有坏。当上述的理论并不教条独断的时候，它可以和大学里教授的文学史——无论是传统的还是重新思考的文学史——达成和解，正像文学和文学性、作者和写作、文本和背景都可以调和一样。宣讲这种已经少了许多傲慢和唯科学主义野心的理论（或者确切地说，是把这种野心留给了研究文化的社会学家），以及将批评用于实践——哪怕是折中的实践，仍然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最墨守成规的人也已经敞开胸襟，接受了老实的皮卡尔所不知道的方法。此后，语言学、符号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都在大学里占据了一席之地，其主要概念已经进入日常领域，各种各样的诠释学、主题研究也出现在教学大纲里。保尔·瓦雷里曾经说过：“一切都止于索邦”。^①我们要说，索邦大学消化吸收了新批评的成果，正像它消化吸收了所有得来的知识一样。而法国的高中，通过职业与教育高等学校（ESPE）——理论几乎成为其教学的全部——这一媒介也不同程度地吸纳了理论。在世纪末的今天，信念具有普世性，能够吸引所有的人。论辩与抨击的时代已经过去，并至少要维持一段时间。谁会为此抱怨呢？

最后我要谈谈个人的经验。我的老师全都属于旧批评阵营。他们是杰出的语文学家、渊博的溯源派。他们对人文科学十分陌生，不了解最新的理论成果。他们阅读文本的方式还和他们的老师一样。然而，他们的学问却远比我们精深。20世纪70年代末，当我在美国的一所大学任教时，新小说被列入了课程，对于新批评，那里的人们却一无所知。文本阅读还只停留于字面的意义，文学史还是亨利·克鲁阿（Henri Clouard）那陈旧的一套。人们还在不断清点和反复检查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随后，政治正确便泛滥开来。

岁月流逝。我的职业让我有机会指导研究生的论文，并读到更多的论文。让我震惊的，是青年学者们理性的兼容并蓄，以及他们对所有滋生贫乏的教条主义的拒斥。博士生们从各处获取资料、工具和参照。他们不是简单地并置，而是将几种方法或语言有机地结合。在他们看来，理论与社会科学、语言学等学科一样，只是诸多工具中的一种。理论本身不是目的。学生中的佼佼者精通叙事学和风格学，对历史和哲学也有所了解。一部作品的历史定位和它的形式技巧的拆解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的接合才让作品获得了严密，文本间性的重要便来源于此。阅读，就是联系。在研究领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真理。任何一种方法——哪怕它是科学的，也无法穷尽拉辛的一部悲剧、《恶之花》或者《鼠疫》的全部意义。批评家们的战争结束了。当代科学已经让我们了解到知识的分化、真理的瓦解和方法的多样。“单一方法论”已成为过去，“多元方法论”确立起来。为学之路永无止境。

〔责任编辑：李永胜〕

^① Paul Valéry, «Oraison funèbre d'une fable». *Variété 1 et 2*, Paris: Gallimard, coll. «Idées», 1978, p. 170.